

的信息需求和时间框架。在履行这一责任方面，他指出了三条途径：发布关键听众和重要性报告(SSAM)，这需要利益相关方进行取舍；发布年度可持续价值矩阵；发布年度综合报告。

总而言之，综合报告本质体现了一种报告的整合思维机制，即在基于某些原则构建的框架内，将重要的财务与非财务信息整合起来，用一种统一而简洁的语言，将公司如何运用其资本可持续地创造价值的情况传递给不同利益相关者。同时，它也是一种纪律和约束，督促公司以一种更全面的视角审视自己，激励其不断提升资本配置的效率和效果、不断完善自身的社会公民形象，从而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为什么要推行综合报告

Robert G.Eccles 教授在演讲中回顾了财务报告的历史演变。他说，美国大萧条后，政府发布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确立了信息披露制度，奠定了现代财务报告的基础。随着时代发展，现行的公司财务报告体系逐渐凸显出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对无形资产反映不够。原因在于目前的财务报告制度以及一些基本会计准则规范大概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制定实施的，那时的美国经济主要靠制造业，企业报表里反映的也都是硬资本，而当下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技术创新、组织架构、制度设计等无形资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在现行财务报告中无法得到全面反映。二是对外部性关注不足。几十年前企业家很少关注污染、碳排放等环境问题和就业、公益等社会问题，传统的财务报告也没有涵盖这些领域。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政府和公众越来越期望企业尤其是对经济社会有广泛影响的大企业能更加重视其外部性效应，能更多地

承担社会责任。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原因，目前国际会计学界研究推行综合报告，一方面强调非财务信息的披露，重视对无形资产、软资本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更为关注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所在地区甚至整个社会的影响，以及企业自身发展中更为长远的可持续性问题的。

在回答企业界代表关于公司编制综合报告有什么好处这个现实问题时，Robert G.Eccles 教授说，短期来说会促进内部管理的提升，比如员工的更广泛参与、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更有效、出现信息孤岛的可能性降低、业务模型的运作更能为受众了解，等等；长期来看，随着综合报告模式在与其使用者的互动中的逐步成熟和投资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企业也会收获来自投资者更为长久和牢固的支持和信任。但他也指出，综合报告虽然很有用，但也并非万能，还需要与其他信息披露机制进行互补和协调。

圆桌讨论中，也有专家从企业自身角度阐述了综合报告在中国会逐渐被接受的原因，认为目前中国许多行业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企业希望做到差异化，希望通过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脱颖而出，而综合报告就是一个优质的沟通和展示平台，能有效增强其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因此，那些大企业尤其是海外上市企业会最早接受综合报告。不过让广大中小企业接受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这需要成本的投入和相应内部机制的建立。

此外，Robert G.Eccles 教授还同与会代表就中国未来在推行综合报告中应发挥的作用，相应的标准如何建立，推动力量来自证监会、国资委还是企业内部以及综合报告的计量模式、履行披露责任与保护商业秘密的权衡、综合报告在私募基金对企业进行估值时起到的作用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简讯

楼继伟为“中国管理会计系列讲座” 第一讲作专题报告

不久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的“中国管理会计系列讲座”第一讲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开讲。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应邀为首场讲座授课，作了题为“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管理会计，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报告。

楼继伟在讲座中系统阐述了管理会计的发展历史和职能作用，客观评价了管理会计在我国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楼继伟要求，要争取在3—5年内建立起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会计体系，在全国培养出一批管理会计师，推动加快管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资格认证制度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建设；通过5—10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基本建成管理会计指引体系，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服务，为提高单位资金使用效益服务，实现我国管理会计跨越式发展，在较短时间内接近或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本刊记者)